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
27 February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35 和 39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

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七年

2012 年 2 月 24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遗憾地注意到，阿塞拜疆代表再次就 1992 年在霍加利居住区发生的不幸事件散发误导性和欺骗性信息。该国代表团已经多次代表阿塞拜疆当局就这些事件进行反亚美尼亚宣传和编造谎言。

现在要做的最有关联的事就是回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众多人权组织关于释放对阿塞拜疆政府有关霍加利事件的说法提出质疑的阿塞拜疆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的呼吁。

亚美尼亚重申自己关于除其他外建立容忍和克制、不进行仇恨宣传的立场；若想在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就得坚持这个立场。就这些目标而言，阿塞拜疆的这个举措不是好兆头。

请将本信及所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回应阿塞拜疆代表的信件的声明(见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5 和 39 项下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加伦·纳扎里安(签名)



2012 年 2 月 24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

2012 年 2 月 22 日，斯捷潘纳克特

随着霍加利事件的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阿塞拜疆就 1992 年霍加利居住区事件再次沉浸在对亚美尼亚的抹黑运动中。霍加利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境内靠近斯捷潘纳克特机场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居民是阿塞拜疆政府人为地密集迁移过去的，特别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的梅斯赫特土耳其族少数民族，目的是加强那里的非亚美尼亚人口并将该村庄升级至乡镇的地位。阿塞拜疆宣传机器用针对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诽谤性声明再次忙于向广大国际社会及自己的公民推销虚假指控和伪造事实，同时继续煽动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

1992 年 2 月 25 日和 26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以解除对霍加利居住区附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机场的封锁。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清除位于霍加利居住区内的阿塞拜疆的战略军事阵地。自 1991 年春天以来的近一年时间里，阿塞拜疆的特种民兵分队正是从该阵地经常用“阿拉赞”、“水晶”和“格拉德”火箭系统袭击附近的亚美尼亚居住区。在此期间，数十名亚美尼亚人被打死，另有数百人受伤和/或被绑架。由于附近集体农场和私人农场的数以千计的牛被驱散和杀戮，该地区的农业遭到彻底破坏。

由于持续封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境内的局势迅速恶化。地方当局面对来自该区域各村庄越来越多的难民，再加上阿塞拜疆对进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所有区域道路实行军事封锁导致大多数食品生产企业被迫关闭。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首都）的局势尤其严峻，因为那里的食品、药品和燃料储备已经耗尽。在这种情况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决定，为确保共和国及其平民的实际生存，解除对机场的封锁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除了解除对机场的封锁外，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还需要清除在霍加利的驻扎着阿塞拜疆特种部队和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准军事部队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团体集中了大量人力和部署用于对附近的阿斯克兰市和斯捷潘纳克特市进行攻击的战略重型进攻性武器。正是因为这些指标，对霍加利的军事行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解除对机场封锁的军事行动于 1992 年 2 月 25 日晚上 11 时 30 分开始，于 2 月 26 日凌晨 3 时结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部队知道村里有平民，因此决定开放两条让平民安全离开居住区的通道并通知了阿塞拜疆方面。一条通道从霍加利东侧沿卡尔卡尔河床向东北方向延伸，第二条通道的出口在居住区北

侧，向霍加利东北方向延伸。但是，阿塞拜疆当局选择不理睬这个善意姿态，在引导平民脱离危险境地方面无所作为。

由于在霍加利的军事行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部队得以解救了 13 名亚美尼亚人质，包括 1 名儿童和 6 名妇女，并没收了 2 具“格拉德”MM-21 型群射火箭装置、4 具“阿拉赞”火箭、1 门 100 毫米榴弹炮和 3 具装甲装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扎赫救援处还在霍加利及其周边发现了 11 具平民尸体。但是，阿塞拜疆宣传部门的新闻广泛传播的关于被杀害平民的录像是在离阿斯科兰市 3 公里(2 英里)和离霍加利 11 公里(7 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拍摄的。必须强调，该段录像的目的是虚假指控所谓的亚美尼亚战争罪，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部队是在 1993 年夏天，即在霍加利战役之后一年才进入拍摄该录像的地区。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在行动开始前 2 个月就已通知阿塞拜疆有关方面这次预期进行的旨在清除霍加利村内的阿塞拜疆军事阵地的军事行动。这一警告行动一再得到阿塞拜疆官员的确认，其中一位官员就是前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但当一群来自霍加利的平民接近阿格达姆区域时，他们受到了阿塞拜疆军队重型火炮的轰炸。这件事后来得到前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的确认，他把这一叛变行为解释为，以错误地指责他该为执行这一命令负责的方式企图推翻他。必须指出，在开展霍加利行动时，阿塞拜疆正经历一次政治动荡，当时一些派系团结起来反对时任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

一位名叫 Chingiz Mustafayev 的阿塞拜疆摄影师被允许进入交换死者尸体的地区。他为了记录死者的遗体作了两次录像，两次录像之间有两天的间隔。在作第二次录像时，Mustafayev 先生注意到，平民的尸体被毁坏了。

在 1992 年 3 月 2 日的另一个场合，在对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地区进行调查性飞行时，记者注意到死者尸体的位置完全改变了，尸体上伤残处的数量也出现巨大变化。鉴于该地区位于至 1993 年夏天为止一直由阿塞拜疆部队全面控制的领土内，公平地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部队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令人遗憾的是，阿塞拜疆不断无视这类重要的细节，而这类细节突显出亚美尼亚军队不可能进行这次杀戮。还应该了解到，重新摆放尸体的目的就是要把责任推给亚美尼亚部队。

这一事实让 Mustafayev 先生非常吃惊，他告诉了穆塔利博夫总统，后者也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穆塔利博夫总统甚至警告 Mustafayev 先生，如果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任何人，他就会面临巨大危险。Mustafayev 先生不太相信阿塞拜疆所坚持的此次事件是亚美尼亚战争罪行的立场并开始了他自己的调查。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在莫斯科的 DR-新闻通讯社，即这个事件不是亚美尼亚人造成的，事

实上很可能是阿塞拜疆民兵犯下的。在收到他的声明后，Mustafayev 先生就在离阿格达姆市不远的地方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了。

在阿塞拜疆当局的要求下两个外国传媒代表小组都列入了捷克记者 Yana Mazalova；用直升机运载这两个小组去调查该事件，通过展示四散在该地区的被毁坏了的尸体的方式来显示所谓的亚美尼亚暴行。Mazalova 在事件发生后就立即访问过该地点，不记得在她早些时候的访问期间曾看到过尸体上有任何毁坏的痕迹。但这次仅仅是在两天之后，让记者们看到的是被毁坏的尸体，以供拍摄。她注意到在她最初访问的仅仅几天之后尸体状况就出现了相当大的不同，这只能意味着犯罪现场遭到破坏了。

军事行动之后一些事件的实际情况仍然不明朗，巴库不断提到这种缺乏信息的状况，以便把这一情景描绘成战争罪行。但在阿塞拜疆官员的说辞中始终忽略了这一事件的关键因素，即在军事行动的不幸时刻，阿塞拜疆军方对一个明确的警告置之不理，从而使其人民受到伤害。此外在发生这种悲剧之后，巴库官员似乎一再忽视那些意味着针对自己公民的恶意行为和明显的战争罪行的事实。但是这一事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过去 20 年来阿塞拜疆政府以歪曲关于霍加利军事行动之后实际发生的真相的手法把霍加利作为其国内外政策的基石。甚至当众多阿塞拜疆高级官员、外国人权活动家、记者及特别是霍加利以前的居民驳斥巴库关于该事件的立场时，阿塞拜疆当局仍然坚决拒绝接受事实，继续使用这种危险的诽谤性言辞。

虽然巴库当局忙于编造虚假信息以使其宣传机器更为可信，但大量的声明和证词显示霍加利事件事实上不是一起亚美尼亚的战争罪行，而是一起扭曲的自我残害的阿塞拜疆暴行。一位阿塞拜疆人权活动家写到：“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蓄意牺牲了该村庄及其公民”（阿塞拜疆报纸 Zerkalo，1992 年 7 月）。另一份由前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提供的证词说：“这起悲剧是阿塞拜疆当局造成的，具体来说是一位上层官员造成的”（阿塞拜疆报纸 Mukhalifat，1992 年 4 月 28 日）。根据 Bilik-Dunyasi 通讯社的报道，甚至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在提及霍加利事件时也承认：“阿塞拜疆前领导也有罪”。1992 年 4 月阿利耶夫总统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流血事件将使我们受益。我们不应该干预事件的走向”。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人民阵线上台，被赶下台的前国家安全部长瓦吉夫·侯赛诺夫说：“在巴库发生的 1990 年 1 月事件和在霍加利发生的事件是同一拨人干的”。他是在暗指新当选的人民阵线领导层。不用说他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判刑。

上述事实清楚证明，阿塞拜疆当局在霍加利的平民死亡事件中是有罪的，并要为在权力斗争中出于政治利益而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承担责任。

同样必须强调，阿塞拜疆一直在挑头开展一场歪曲有关霍加利事件的真相的运动。这种造假的一个实例就是改变受害者的实际人数。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部队清除了在霍加利的军事据点仅仅几天之后，阿塞拜疆官员就说，总的伤亡人数估计为大约 100 名平民。一个星期内根据一个议会委员会的说法，这一数字一下跳到 1 234 人。然后该数字调整为 450 人，同时盖达尔·阿利耶夫指出，所谓的“阿塞拜疆种族灭绝罪行”使数千名平民丧失。事实上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官方记录记载霍加利的人口还不到 2 500 名居民。大多数人只是登记在霍加利，以使其地位从村庄上升到乡镇，而在军事行动期间实际上并不在那里。另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在军事行动之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爆发之初就已逃离了村庄。

1992 年 3 月初，阿塞拜疆记者 Ilya Balakhanov 和 Vugar Khalilov 将犯罪现场的录像带到人权纪念中心办公室，在该录像里有巴库电视台记者从军用直升机上拍摄的平民尸体的镜头。所有在场的人都说，在观看该录像时已确认，实际尸体数不超过 60 具。

为进一步证明阿塞拜疆的歪曲运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官员在网上透露了一张看起来是有关霍加利伤亡者的伪造照片。这种照片立即在阿塞拜疆网站上大为流行，甚至被登载在盖达尔·阿利耶夫基金会的网站上。该照片作为霍加利大屠杀的证据被登载在无数网站上，而事实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官员知道，该照片实际反映的是在距离霍加利 1 千多英里之外的科索沃发生的不幸事件。值得一提的是，阿塞拜疆政府不断利用土耳其军方提供的取自库尔德大屠杀事件的图像作为霍加利事件的虚假证据。这种抹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说服那些不知情的受众，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政府描绘成侵略者和罪犯，而事实上正是阿塞拜疆当局在犯撒谎和谋杀的罪行。

辞职一个月后，下了台的穆塔利博夫总统接受捷克记者 Dana Mazalova 的采访，《独立报》发表了这次采访。在谈到霍加利时，穆塔利博夫说：“根据逃出来的霍加利居民的说法，这次事件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赶我下台。政治候选人(暗指人民阵线)精心策划了这一事件，目的是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放在我这个总统身上，最终赶我下台。我不认为亚美尼亚人该为这起罪行负责，毕竟他们在许多其他可很容易犯下战争罪的情况下能以专业方式行事。一般的推理是，亚美尼亚军方开放了一条供平民使用的通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向平民开枪呢？特别是在一个靠近阿格达姆的地区，那里有大量阿塞拜疆部队可向平民提供援助”。

大约 10 年之后，阿塞拜疆前总统穆塔利博夫在接受《新时代》杂志采访时再次确认自己的想法：“很明显对霍加利居民的大屠杀是某些人组织的，目的是挑起巴库的权力斗争以解除我的总统职位”。

2005 年 2 月，来自独立杂志《监测员》的阿塞拜疆记者 Eynulla Fatullayev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呆了 10 天，他在写作和采访中讲述了他的访问情况。他还敢于挑战巴库官员关于霍加利一些居民死亡的说辞的真实性，“……10 年以前我曾有一次遇到在纳夫塔兰（巴库附近的城市）暂时栖身的霍加利难民，他们坦率地告诉我……在发生攻击的前几天，亚美尼亚人用扩音器一直警告居民计划开展的行动，建议平民离开居住区，通过沿卡尔卡尔河的人道主义通道突破包围圈。根据一些霍加利平民的说法，他们利用了这条通道，在通道另一侧的亚美尼亚士兵没有向他们开枪……在熟悉了地理情况后我可以自信地说，巴库提出的没有亚美尼亚通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通道是确实存在的；否则被完全包围并与外部世界隔离的霍加利居民不可能逃出包围圈。难民们穿过卡尔卡尔河地区后分成了几批，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其中一些人逃到了纳希切万尼克”。

《监测员》杂志发表 Eynulla Fatullayev 发自卡拉巴赫的第一篇报道之后没几天，即 2005 年 3 月 2 日，该杂志的编辑 Elmar Huseynov 在走进他在巴库的家时被一个陌生人暗杀了。而 Eynulla Fatullayev 则被判定犯下一系列被指控的罪行，包括因他有关霍加利的报道而犯下叛国罪。

前阿塞拜疆国防部长 Ragim Gaziyeu 同样证实霍加利事件是给穆塔利博夫总统设下的政治陷阱。他说：“在霍加利为穆塔利博夫设下了陷阱”。霍加利大屠杀的组织者以这种方法可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把在苏联垮台后已变得不太受欢迎的穆塔利博夫赶下台，同时把亚美尼亚部队描绘成侵略者和战争罪的实施者。而阿塞拜疆当局对阿塞拜疆部队不断炮击斯捷潘纳克特这座住满无辜居民的城市这样的事实则完全熟视无睹。

一位霍加利妇女在 1992 年 4 月 28 日接受《赫尔辛基观察》报的采访时说：“亚美尼亚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即霍加利居民最好手持白旗离开村镇。Alif Gajiyev（负责防卫霍加利的领导人）在 2 月 15 日（即攻击前 10 天）通知了我们，但这并没有使我或村里其他公民害怕。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夺取霍加利”。在听到这些警告后，霍加利的大多数平民人口在得知计划进行的行动后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撤离到安全地带。阿塞拜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广泛报道了从霍加利疏散的大规模移民过程。在报道疏散过程时，阿塞拜疆传媒煽动起对那些离开霍加利的人的消极态度，并且不停地骚扰他们。我们要指出，后来成为乡镇的霍加利最早是被人为地迁徙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梅斯赫特土耳其族人放弃了。此外，霍加利镇政府在得到亚美尼亚方面的警告之后请阿塞拜疆军人协助疏散民众，但这些要求未得到理睬。霍加利镇长在接受莫斯科报纸 Megapolis-Express 的采访时指出：“在得知关于即将发生夺取村镇的行的消息之后，我请阿格达姆派直升机把老人、妇女和儿童撤离出去。但是未提供任何协助”。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阿格达姆分支机构的一个理事 R. Gajiyev

说：“我们原可帮助霍加利人的，我们有相应的部队和能力，但是巴库当局想向人民证明他们没有部队，希望能呼吁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军队提供帮助”。

事实清楚表明，霍加利居民完全是被抛弃了；而这些公民不知道的是，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丑陋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军事行动开始时，霍加利的部分平民人口早已离开了该居住区，到 1992 年 2 月下旬，根据独立来源的资料，留下来的有 1 000 至 2 500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士兵。人权纪念中心的观察员在调查霍加利的破坏情况时确认，发生了炮击而不是城市巷战。巴库官员现今的指控是，亚美尼亚部队在进入乡镇时犯下了战争罪行，而事实上大多数伤亡是在炮击乡镇时造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部队是按照现代国家国防军的模式组建的，卡拉巴赫军队牢记这一点并遵守严格的命令。在这样的指挥下，如下命令明确得到执行：伤害无辜平民是非法的，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军队进入乡镇后，留在霍加利的的所有平民都被迁徙到斯捷潘纳克特，并在几天后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在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将他们移交给阿塞拜疆当局。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莫斯科人权纪念中心协会的一份报告确认了向阿塞拜疆自愿移交霍加利公民的事实，圣彼得堡记者 Svetlana Kulchitskaya 拍摄的纪录片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莫斯科人权纪念中心的报告指出，国家法医在阿格达姆对 181 具尸体(130 个男性和 51 个女性，包括 13 个儿童)进行了刑侦检查，而所有难民都是从阿格达姆来的。专家的结论是，151 人是因枪伤死亡，20 人被导弹炸死，10 人被钝器打击致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告诉观察员，他们向阿格达姆移交了大约 130 具尸体(所有在霍加利和纳希切万尼克附近被杀死的人)，其中 96 具尸体在阿格达姆安葬，其余尸体被其亲属领回。

对不同来源包括阿塞拜疆来源提供的信息进行比较，结果令人信服地表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自卫部队没有计划、特别是没有对在霍加利居住区的平民采取任何屠杀行动。

还应该指出，在 2 月 26 日，47 名亚美尼亚人在霍加利被劫为人质，在行动之后留下来的只有 13 人(包括 6 名妇女和 1 名儿童)，其余 34 名人质被阿塞拜疆人带往一处无人知道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可证实他们是否在阿塞拜疆的监狱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霍加利的居民成了巴库当局不公平政治游戏中的人质，并且巴库当局后来还以政治手段操纵了这一悲剧。巴库当局试图把阿塞拜疆当局对霍加利居民的背叛说成是亚美尼亚对苏姆盖特血腥大屠杀的报复。整个宣传就是以言辞影射的方式增强对亚美尼亚人的不容忍和仇恨。巴库当局不时提出“霍加利”问题，试图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苏姆盖特、巴库、基罗瓦巴德、汗

拉尔和阿塞拜疆其他居住区发生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上吸引开去，而在那些地方确实发生过普遍灭绝当地亚美尼亚人的事情。这种大屠杀还发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边界居住区，特别是马拉加村，1992 年 4 月入侵的阿塞拜疆正规军小部队在那里杀害了大约 100 名平民。

令人遗憾的是，阿塞拜疆人犯下的罪行未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相应关注。
